

# 问道北大

于仲达的新思考与批判



于仲达◎著

北大听课五年，这本书记录着我最为珍视的精神档案，  
是一个曾经的苦痛者写给正在困惑的年轻人看的书。

我常想，一个人若能有些时间仰望浩瀚的宇宙、时空，  
观照自己的内心，直面大化流行世界，该是多么幸福啊。

何钱理群 楼宇烈 杨立华  
曹文轩 王良志 博士  
叶曼曼 刘小枫  
陈鼓应 郁达夫  
孙立天 高远东  
徐小跃 林谷芳  
陈晓明 李超杰  
吴晓东 吴晓东  
陈行超 孙立天  
高远东 徐小跃  
徐立天 郁达夫  
方立天 高远东  
孙立天 徐小跃  
陈鼓应 陈晓明  
刘小枫 陈晓明  
朱良志 陈行超  
王博 曹文轩  
叶曼曼 吴晓东  
杨立华 陈行超  
楼宇烈 陈鼓应  
王良志 刘小枫  
博士 叶曼曼  
生命清供 曹文轩  
思辨与生命 陈鼓应  
儒者的醒觉 陈行超  
唯美与悖论 陈晓明  
丰富的痛苦 陈晓明  
沉潜与中道 陈行超  
佛学家的人文关怀 陈晓明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 问道北大

于仲达的新思考与批判

于仲达◎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问道北大——于仲达的新思考与批判 / 于仲达著.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4.3

ISBN 978-7-5078-3695-0

I . ①问… II . ①于… III .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15899号

## 问道北大——于仲达的新思考与批判

著 者	于仲达
责任编辑	张娟平 孙兴冉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a href="http://www.chirp.com.cn">www.chirp.com.cn</a>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500千字
印 张	31.5
版 次	2014年3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4年3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695-0 / G · 1427
定 价	68.00 元

CRI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微博

官方网站 [www.chirp.cn](http://www.chirp.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 目 录

钱理群：丰富的痛苦 .....	(1)
星云大师：以心印禅 .....	(22)
何怀宏：沉潜与中道 .....	(36)
李零：读书人的“野性” .....	(51)
楼宇烈：佛学家的人文关怀 .....	(63)
杨立华：儒者的醒觉 .....	(83)
曹文轩：唯美与悖论 .....	(128)
王博：思辨与生命 .....	(145)
朱良志：生命的清供 .....	(183)
叶曼：国学老人 .....	(202)
刘小枫：拣尽寒枝不肯栖 .....	(219)
净慧法师：禅在当下 .....	(241)
陈鼓应：沉痛与逍遥 .....	(257)
孙郁：抵制粗糙 .....	(270)
陈平原：压在纸背后的“人” .....	(284)
方立天：佛学人生 .....	(301)
周学农：“空”也是“空” .....	(325)
徐小跃：儒道佛与人生 .....	(346)
高远东：以鲁迅为方法 .....	(355)

林谷芳：生命的归零	(368)
明贤法师：释迦太子的启示	(388)
吴晓东：文学性的坚守	(398)
李超杰：为什么会有恶	(411)
行者：追寻弘一大师的足迹	(421)
陈晓明：另一种匮乏	(439)
孔庆东：“我执”和“法执”	(463)
附录 学习是一种修行	(476)
后记	(493)

# 钱理群：丰富的痛苦

## 引子·印象

2007年春季的某个下午，一个朋友告诉我说，黄子平要在北大做“鲁迅六讲”。我便前往。

6点45分，到了五院北大中文系教研室，走进门去便见一个和蔼的老头，穿着朴素，硕大的脑瓜，秃顶，花白头发，笑呵呵的，黄子平先生在一旁和他说话。我看过了钱理群先生的照片，心想这就是传说中的“老钱”了。

那晚，中文系学术报告厅挤满了学生，前八排给中文系本系学生预留，我只能站着听讲座。讲课开始，钱先生做了主持，简短地说了话。他说自己没有幽默感，过分精神化，对日常生活不关注，并说缺啥补啥。

1985年，钱理群与黄子平、陈平原共同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也就是这个概念引起了我对于他们三人的关注。不过那时，我对学术没有什么感觉。

黄子平先生说话幽默，他称钱先生“钱老”或“老钱”，谈笑之中自有一般学者难有的达观和睿智。北大中文系师生习惯于称钱先生为“老钱”，我也喜欢这种称呼，感觉亲切。最先接触钱先生，是十年前读了他的《心灵的探寻》，依然记得当时很苦闷的困境中阅读时的那份激动心情。那是一个寂寞的青年在一个暗夜里突然感受到一颗滚烫的灵魂，瞬间孤独与忧愤被点燃，那一刻我决定打破“铁屋子”！此后的几年时间里，他的著作摆放在我的书柜里，在艰苦的困境里支援着我的精神！在我的阅读感受里，钱先生的文章充满了激情，充满了冲击力，内心始终充满着紧张，用“峻急”、“纯粹”、“郁

热”、“极端”、“灵魂分裂”这些词语或许可以概括他的精神侧面。如今见了钱先生，他给我的最大感受就是饱受世俗风沙的消磨，却始终能满怀热忱，这十分难得。

2009年4月19日14时，钱理群先生的身影又出现在国家图书馆二期新馆学术活动厅（学津堂）里。他这次开讲“对鲁迅的再认识及其在当代的意义”。他说鲁迅有三个拒绝：他拒绝被体制收编；他拒绝被任何一种思想文化体系所收编；他也拒绝收编我们。钱先生特别提出，在鲁迅生活的时代，他面对着两个困惑：东方专制主义的困惑和西方文明病的困惑。今天的中国，情况远比20世纪初要复杂，我们现在是一个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在一起的社会。这个问题引起了我长久的思考，相比鲁迅的时代，这个问题更复杂。

我从安徽来到北大学习，不正是为了深入思考这个问题吗？当下面对的问题空前未有地复杂，所以我们面对问题的态度也要空前未有地复杂。然而，钱先生面对问题提出的解决之道还是鲁迅式的“横站”，我猛然觉得他笼罩在鲁迅的身影里。单一的精神视野，已经不能更深入认识当下这个世界了。我深深感到“老钱”的局限。理解“老钱”的局限，对于21世纪的我们，或许比理解老钱的“伟大”更有意义。

---

从1985年走向讲台给81级的学生讲鲁迅，到2002年正式退休，钱先生在北大连续给22届的学生讲了17年的“鲁迅”，其中还不包括给研究生开设的鲁迅、周作人研究的专题课。与其说钱先生是“研究鲁迅”，不如说是“拥抱鲁迅”。从钱先生有关鲁迅的文字中，可以看到他始终把自己的灵魂投入到研究对象之中，拿全副灵魂、思想去和对象交流、融合。我几乎买了他所有的著作，个人以为他写得最好的是学术随笔《拒绝遗忘》。老钱的人格力量值得称道，可惜他对于鲁迅的理解过于乐观和激情，而鲁迅本质上是一个孤愤的性格悲观的人。一个北大文学博士说，老钱的鲁迅研究只能说是关于鲁迅的读后感，我谅解这位老乡的狂妄。在北京大学，以至整个日益功利化的中国大学校园里，钱理群先生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注定是个异类。

钱先生从“民间”走出，带有鲜明的不同于学院学者的生命体验，深刻吸引了一批人。这么多年，我在网络活动中，结识了一批网络思想者，有着相似的精神取向，大多喜欢钱先生。他们是南朵、陈愚、相似的你我、燃烧的海水、阿啃1919、梁卫星、崇拜摩罗……记得2002年年初，在当时的《读书》论坛，我见到一个网友在发帖求购钱先生的大著，这就是“崇拜摩罗”。我清楚地记得他在回信中那掷地有声的一句话：“我也要做一个精神战士！”一个年轻执著的声音，令我震颤！随后，23岁的他几经辗转，慕名前往北京钱理群等他崇拜已久的“精神界战士”家中拜谒求教。尚是一个军校学员的弟弟，怀着一腔怎样激越澎湃的少年情怀，揣着一个觉醒了的孤独的灵魂，只身奔赴北京，走向他的偶像……

由此可见，钱先生当初是如何影响我们精神世界的。

钱先生是一个特别有激情不说假话有真性情的人，用高远东先生的话来说他是位“天才的演讲艺术家”，这点从他的系列专著中就可以看出来。关于钱理群先生的讲课风采，曾经有听课者回忆道：“老钱擦完黑板并不将黑板擦放归讲台或者黑板支托，而是拿在左手，同时右手也捏着粉笔，继续激情澎湃、滔滔不绝地讲课。他双手不时在空中舞划着，这样一堂课下来，纷纷扬扬的粉笔灰落在他的头上、肩上和脸上，和他流出的汗混合在一起。不用说，老钱对一堂课的付出是很多的，而得到的回报是下课时的热烈掌声。”北大中文系的邵燕君女士称钱先生是中文系几级学生共同的精神导师，她这样回忆听钱先生讲课的情形：

教室照例被挤得水泄不通，连窗户上都“挂”着人。讲演快开始时，通道的人群中闪出一条缝，有人说：“钱理群来了。”我朝教室门口望过去，只见一个又矮又胖的中年人踉踉跄跄地挤进来，脑袋硕大，头顶半秃，衣服好像也蒙着一层再也洗不出来的土灰色……

阅读钱理群先生的大部分著作，可以感受到他内心深处的苍凉与苦痛。我读过孔庆东先生的《恭贺钱理群老师六十寿辰》、《侠之大者，钱理群》、《我看钱理群》，他把钱先生看作“大侠”、“恶僧”，称“钱理群给予青年的是一团熊熊燃烧的活的启蒙精神”；汪晖先生说钱先生就像黑塞笔下的那只“荒

原狼”，整整一生，他将把全部想象的天才、全部思维能力用来反对自己；王得后先生指出，老钱站在鲁迅与自己学生之间，清醒地、自觉地充当“中间物”，这是很宝贵的；孙郁先生说他读《心灵的探寻》时，感觉调子是惨烈的、悲怆的，也多少染有苦行僧的色泽，然而日常生活的他，却儒雅得很，与苍凉的韵致相距甚远，读钱氏描绘“鲁迅式”知识分子的论述，可以感到他内心的激情，并感叹道：“今后的大学讲坛，像他一样激情四射、颇有信念的老师，很难见到了”；王乾坤先生指出钱先生的著作吸引他注意的主要不在于学术和思想，而在于作者本人生形态的置入，也就是把自己熬煎在里边；王吉鹏先生指出钱先生的研究“不是聆听僵硬的说教，见到的不是陈腐的学究气，而是同作者一起走过一段灵魂升华的天路历程”；摩罗先生的《半佛半魔钱理群》一文称赞钱先生半佛半魔。

钱理群先生的意义不在于启蒙了什么，而在于怎么启蒙。他带着生命的体温直面世界，敢于撕下自己的面具，给我的精神冲击是强烈的。有时候不免纳闷，钱先生是一个乐观激情的人，鲁迅先生是一个特别沉郁的人，性情差距之大，他果真能深入鲁迅先生的心灵世界吗？读过王得后、汪晖、王乾坤、陈思和、孙郁、吴晓东、邵燕君、薛毅等评论钱先生的文章以后，我觉得老钱是一座“铁屋子”！心想：鲁迅先生被他讲到这种程度，我还能再说些什么呢？！这个问题一直挑战着我，让我不敢懈怠，随时做好突围的精神准备。

我既非钱先生的嫡传弟子，也非北大中文系的学生，而只是一个读过他的书受到他精神滋养的人。我承认，自己不是个爱热闹的人，即便钱先生就在身旁，也只是习惯冷眼看风景，而不会轻易主动上前搭话，更不会随便想加入到某个群体中。但是，作为长者，一个把生命与青年学生的血肉联系的北大教授，我对他表示尊敬。但是我从那些并非溢美之词的评论钱理群的文章中，隐隐看出“老钱”精神影响的负面作用。太急切，太激烈，往往不能持久，往往变得无聊。

没有去京之前，我多少有点“导师情结”；到了北大之后，情结彻底破灭了。那些称颂钱先生为“佛”和“大侠”的弟子们，各个都被时光打回原形，蜕变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想想曾经对他们的期待，我本能地有些不适。叹息，如今的一些“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人格的力量，沦为庸人俗人。即

便在北大，真正做学问的，可能不多，今后像钱先生这样的学者更是稀缺。大家都很浮躁。更要命的是，一些学者人品很差，甚至超越一些底线。如何让我对他们有精神期待呢？正是鲁迅先生的鞭策，让我克服了自己的局限，忍受多年的重压而有所升华。关于这点，我十分珍视。

## 二

近年来，研究鲁迅的似乎越来越多，靠研究鲁迅获取职位、职称，获得安身立命、扬名的人越来越多。我曾经在 2008 年去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查了关于鲁迅研究的论文。各种各样以鲁迅为题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和资料汇编，吓了我一跳。但是，我仔细查阅其中的多数论文，除了那些熟悉的引文，大多缺少什么重要价值。

鲁迅研究有愈来愈经院化的趋势，更有不少学者持各种理论否定鲁迅，或者把鲁迅大卸八块，只有少数人是在鲁迅止步的地方和逻辑的指向，向前推进。鲁迅本人是个直面人生、与人间保持密切关系的人，如果我们的研究不能和这些人的生存结合起来，那是没有意义的，当今鲁迅研究的最大问题就在这里。有学者高呼，回到鲁迅去，打破符号化的鲁迅，直接靠近鲁迅的生命本体。鲁迅的生命，是“反抗绝望”挑战生命极限的生命，而不是书斋里的学者，那些用各种理论、各种框架对鲁迅进行学术肢解的“学院派”和以鲁迅精神传人自命的谬托知己者，向来为鲁迅所憎恶。一些学者缺乏开放、敏锐而又切实的“问题意识”，隔靴搔痒、牵强附会，另有一些所谓文化基督徒和自由主义者，根本不去深入地读鲁迅作品，而是主题先行，预设一个框架然后把鲁迅装进去随意涂抹。一些研究鲁迅的人，恰与鲁迅的生命精神相去万里。鲁迅最终离开厦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鲁迅发现，学术研究只是中国社会的一种点缀，一种文化摆设，他并没有感觉到学术对中国的意义和价值。鲁迅离开厦门大学，实际上是与学院文化的决裂。我觉得学院文化有一种惰性，看似公允实则没有什么意义。

钱先生 1960 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贵州一所卫生学校教语文。他自己在贵州下放了 18 年，贵州可谓他的“第二故乡”，对身处底层的人的心

情有切身体会。他在那里写的鲁迅研究札记，有一两百万字。钱先生身上有一种可贵的民间的底气，“我一直没忘了贵州，一直把她留着。我走了一条学术的道路，原来是比較野的，现在要纳入到正轨当中去，这是很痛苦的过程。获得了学术界承认，具有发言权后，新的矛盾又产生了：野性还在，不习惯学院的束缚，总忍不住站出来为底层说话”。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钱先生一直警惕被学院、被知识、被权力收编，他的学术研究实际上是自我生命的“挣扎”。钱先生对于知识分子的研究，决定了他文学研究的理论特点：首先，它不是纯粹文学研究，而是思想史、文化史的交结；其次，这研究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带有自我反省、自我解脱、自我升华的特性”。我特别喜欢他身上的那种“野性”，这种“野性”在日趋体制化学院化的今天，越发少见了，即便在北大，我看到的都是“规矩”的学者做着“规范”的论文，日益感觉生命的窒息与压抑，内心感觉痛苦。

我感觉，一个不能与人间建立精神联系的学者根本称不上丰富深刻的学者。钱先生曾经说：“贵州和北大是我的两个精神基地，民间与学院，对我来说是一个互相补充，也有冲突矛盾，但这就是我的思想和学术特点。”然而，真正打动我的是作为“民间思考者”的钱理群，而不是作为学者的钱理群。他的“民间立场”，就来源于鲁迅。已经告别北大的钱理群先生，依然孜孜不倦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中学语文教育，无论是在学院还是在民间，钱先生一直没有放弃自己关注当下问题的人间情怀，让人尊敬。和那些在象牙塔一路修行的学者不同，钱理群先生是带着自身丰富的经历闯入学术界的，他有自身要面对的问题，对北大的硕士、博士教育相当失望。钱理群先生的鲁迅研究是生命化研究，他的教育是生命化教育。始终有赤子般的纯真，对世界、社会、学术永远有好奇心与新鲜感，因而具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

北大中文系现当代文学教研室的所有教师，都对鲁迅有所研究。估计像老钱这样拿灵魂投入研究对象的，不会很多。邵燕君女士说，钱先生的研究实际上是在“读人”，是“体验”、“相遇”，“彼此纠成一团，发生灵魂的共振”。

钱理群自称“不追求永久的学术价值”，这与追求学术规范的学院学者决然不同。也正因为如此，他深受青年学生的喜爱。钱先生曾经说他写作

主要是感受型的而不是研究型的，他自己的定位就是“中间物”，自觉践履鲁迅精神，当代知识分子中很少有人像他这么清醒着。承认自己的有限，而又不拘泥于有限真是可贵。老钱讲鲁迅时把自己燃烧在里面，投射着自己的灵魂。

钱先生不是一个“书斋、艺苑里”的“纯学者”：他虽然身居学院，却没有把自己禁锢在“象牙塔”里，而是直面现实，强烈地拥抱现实，坚持对现实进行反思与批判。正如郭春梅女士所说，那种面对研究对象时所感受到的永远的心灵的劫难，那种深刻执著的救赎意识和博大深沉的人文情怀，赋予了他的著作一种诗意的光辉。读他的著作，我们分明能够触摸到他内心深处的苍凉与苦痛，柔情与悲悯。那是一种不相信彼岸世界却又真诚地追寻彼岸世界的鲁迅式的“绝望的反抗”，是一种用博大的历史热情烛照现实存在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而这，正是钱理群先生的魅力所在。

钱先生说，不要只是咀嚼自己的苦痛，而要把苦痛化为精神上的财富。是的，仅有痛苦和愤怒是不够的。在安徽那个闭抑的环境里，钱先生的著作鼓舞了我，这是他著作的迷人之处。可是，在我看来，人可以依靠激情鞭策自己，却不可用激情处理问题。

钱先生常常带着自己强烈的主观感受去研究鲁迅、曹禺、穆旦等作家，这种过分的融入往往让他无法从容抽身，显得有些“峻急”、“郁热”、“极端”、“灵魂分裂”、“躁动”等，钱先生特别喜欢宏大的词汇，比如“20世纪”、“中国”、“中西”、“大”、“知识分子”等，宏大叙事带来的激情虽然能感染人的情感，给人以力量，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钱先生过分的启蒙姿态，不受羁绊，过于单调、沉重、精神化和脱离现实，丧失多角度观照生活的视角，精神资源过于单一，却无助于解决问题。这种抽象的激情容易让人产生对鲁迅的“误读”，从而产生只想当英雄和圣人而不去做普通人的想法，这是值得注意的。钱先生在间接向读他书的后生传递他这代人的痛苦，难道就不怕培养出新的“醉虾”？钱先生过于看重所谓“知识分子”的作用，他有一种“奴在心中”的痛苦，想做永远的批判者，永远不满足于现状，事实上这也只能是极个别知识分子的选择，不足以效仿与推广。我觉得在一个健康的社会，“知识分子”越少越好。

### 三

对年龄太小就被鲁迅深深影响的人，是必须加以警惕的。这些人常常是因为生存环境的恶劣，在鲁迅的火山那里找到一个虚幻的爆发口。而实际上，无论是思想还是学问，他们空空如也（当然，这话有“自食”的味道）。如果不确立自己的思想或者学问，他们就会跟着感觉走：今天担当个体的苦难，明天唱唱集权的赞歌，看一份自由主义的宣言，马上变成一个极端的自由主义者，听一场民族主义的演讲，马上就变成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唯一保持的是极端，从这个极端跳到那个极端。钱先生所一直思考的改造人性、根除奴性、拒绝遗忘、摒弃虚伪等，可能是永久的问题，不是哪个时代一下就能解决的问题，可能变成一种思想重压压制年轻人的精神发育，应该到成年后再慢慢思考这些问题。只要看看当下的少年就可以知道，他们对学校教育、对社会、对人生都充满了调侃，从中透露出看透了一切的冷漠。学生的情况，资质各有不同。面对这种状况，如何启蒙？还统统用鲁迅激发他们对社会更强烈的憎恶和批判吗？钱先生再怎么爱鲁迅，这是他本人的嗜好，可实在不能执著。

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退休后的钱先生到处给中学生和小学生开讲鲁迅，是值得忧虑的。记得鲁迅先生当年曾经明确反对将自己的文章收入中学生课本，不知钱先生记否？钱先生自然能忍受精神煎熬，而且能在残酷的环境中挺住，可是，那些年轻孩子呢，就不一定了。给孩子们打“精神底子”的想法是好的，但是，应该是多元化的精神资源，不能只讲一个鲁迅，这很危险。联想到钱先生在南京师范大学附中开设“鲁迅作品选读”课，我就隐约担忧起来。现实是冰冷无情的，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也很多，在这样的环境里，让那些处于“幸福时光”中的中学生去读冷硬的鲁迅，难道不是惊扰孩子们的好梦吗？

钱理群、余杰、摩罗等人的书最初曾给了我自足的勇气和激情，对于困境里建立自我起到很大作用，他们普遍受到鲁迅的积极影响，致力于批判专制，承担知识分子的使命，这些都是有正面意义的。可是，我也从他们身上

洞察到了某种虚妄的精英主义，突出表现在文风上就是抽象的激情、标新立异、自相矛盾、主体固化，用佛教的话来说就是陷入“我执”和“法执”之中。就连钱理群在北大一次讲座中，他本人也感叹自己太精神化不幽默，可见这是一个值得解决的问题。鲁迅先生是一个具有自我认知能力的人，并且在提升自我的同时消融了自己。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局限性，开始显露出来，为我警惕。

钱先生身上有鲁迅式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气质，偏激、峻急、郁热，缺乏缓冲，缺乏“文人雅趣”和“生活的艺术”，缺乏鲁迅身上的士大夫趣味，虽然延续了鲁迅的精神脉息，但缺少了魏晋风骨，缺少了多元意识下的平和与从容。钱先生自以为“真诚”、“自由”、“酣畅淋漓”、“野性”，其实，他很少警惕自我中心的立场。这是知识分子的幻觉，自以为在中心，其实还是边缘。

钱先生不是不具有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精神，只是这种精神无法抗拒他自身的激情。他彻底被激情淹没。钱先生身上有着一种英雄主义式的“拯救情结”，他的反思也未能超越这种情结。虽然他的气质、语言风格、知识修养和鲁迅有着很大差异，但是却并不妨碍他从鲁迅那里获取精神的活水，鲁迅就是他的精神父亲。鲁迅对钱理群的投影，太深太深，他捣毁“精神避难所”，指出只有在严峻地审视、解剖自己的灵魂，“煮自己的肉”的过程中，才能真正理解与接受鲁迅。有学者指出，钱理群似乎一直无法轻松地宣告他从这一代的局限性中摆脱出来，相反，他总是感受到这种精神重压，并时时咀嚼，称自己为“历史中间物”，称自己的学术研究是一种生命的“挣扎”，其间渗透着悲凉的人生境界。有学者断言，他“永难摆脱这种心灵的劫难”。让后一代年轻人跟他一起作精神漫游，去煎熬于什么“丰富的痛苦”，难道钱先生就不担心误食他苦果的人吗？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痛苦，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玩赏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对此，我曾经吃过不少苦头，这是我的亲身体验。所以，远远地静听“老钱”讲课觉得好玩，靠近他你就会被他灼伤。

钱理群身上，激情往往大于理性的思考，而且他身上过多的“北大式”的自负，甚至让我感到疏远。这不是杞人忧天，实际上我在阅读钱先生大著

时就曾经遇到精神折磨。钱先生也曾警惕自己的历史包袱影响年轻人，强调学生“依自不依他的选择”，他非常认真地学着鲁迅说，自己这一代不过是“中间物”。钱先生“动情的”，“眼睛闪着光”，“沉迷于一种宗教般的感情中”，但是，他没有稳定的信仰支撑，当然就局限于一种丰富的精神痛苦中了，这是他和他这代人的精神宿命。

显然，钱理群对此是自知的，也在反思自己的“鲁迅观”，只是这种反思缺乏更多的精神资源。他认为，他所面对的问题，对问题的思考、处理方式，以及产生的问题，包括遮蔽、失误等，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钱先生总结这代人的悲剧性：“尽管就个人才华、天赋而言，特别是后天努力、勤奋的程度，我们未必就一定逊于前辈与后人，但深受‘书读得越多越蠢’的时代思潮所造成的‘文化断裂’之害，致使我们中间很难出现大师、大家级的人物：非不愿、不为，乃不能也；而‘能’又确非自己的责任。”

孙郁先生指出钱理群“在潜意识中形成了一种迷恋鲁迅的情结”，由此而导致了鲁迅研究的缺憾（局限）：“鲁迅在钱氏的塑造与诠释中，仍然是一尊神，一尊启蒙主义之神，一尊张扬个体精神之自由的神。”他指出，钱理群的精神色调，带有很大的标本意义，他是“锁国时代”培养的一代知识分子，内心投射着很长的单值价值之影。而当锁国时代崩解之后，那种愤怒、悔恨、警惕、自醒乃至抉心自食，便强烈地呈现出来。读他的书，一个核心的母题，便是警惕“奴性”的产生，以及对历史的遗忘。钱理群的文章不像王瑶那么有着悠然的魏晋之风，亦无赵园式的隽永、清秀。他的论著大多直逼中心题旨，士大夫式的雅趣是淡薄的。他谈论鲁迅时，充满了精神的紧张，好像也置身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氛围里。听他的讲演，与鲁迅似乎没有时代的距离感，已经将自身的一切，位移到那个世界里了。

孙郁先生上述见解，点到要害上了。钱理群先生曾说，20年来他所做的工作，集中到一点，就是“讲鲁迅”，并且试图“接着往下说”，以便把民族、家庭与个人的世纪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请教钱先生，如果您缺乏一种深广的人类的精神背景，如何讲鲁迅？鲁迅先生在形成自己“是非”以前，他的精神视野是十分宽广的。钱先生这种“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的做法，不利于多元文化时代的精神构建。我觉得钱理群先生的问题不在于对鲁迅讲得“太多、太过头”，而是讲述的方式。仅仅就鲁迅讲鲁迅，而不是把鲁迅置于

中西文化语境下讲，这种精神视野本身十分狭窄。

钱理群一生目睹与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对中国的国情、民性、人心，有着较为深切的观察，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也有着同样丰富的生命的体验。正是这些“丰富的痛苦”帮助他逐渐接近与认识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并且化作了自己的血肉。但是，他与现实距离太近，无法深入超越的思考。他有一种迷恋鲁迅的情结，执于痛苦，抚摩苦难，这无疑给后来读者制造了精神包袱。

陈平原先生曾戏言钱理群是“好为人师”，这就抓住了他的特点。对于经过中学应试教育刚考进大学校门的北大学生来说，声望很高的思想者和启蒙者钱先生就是他们的精神导师。青年学生满足的只是一些概念和判断，还有青春的激情，而不是多元文化背景下健全理性的思考，钱先生自然深受他们喜欢。因为钱先生的原因，不知不觉之间我就把北大理想化了。特别那一些认真对待生活不愿浑浑噩噩地过一生的青年人，和我的心境多少是通着的。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中国已经从宏大叙事转移到日常生活中了，再拿着“五四”时期的所谓“启蒙”那套单一价值来理解当下社会，确实不合时宜了。面对强势的西方文明，如果无法建立起一种新的经验，我们就只能成为他者、弱者、无能为力、没有人格的“西崽”。某一类深受西方影响的知识人，好像是一些吊在半空的人，他们的人格是分裂的，一方面无法处理具体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在普通民众面前又自觉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这样的伪精英伪贵族，确实太多了。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弄清楚自己是谁，不应在潜意识里老是想着成为“精神界战士”，应该培养做事的能力，“灵魂”和“良知”应该体现在具体操作之上的，他们应该放下无意义的“高洁”、“清高”进入操作，不要老是把自己当珍珠，炮制一些让大众疏远的理论，似乎充满智慧，却又不知所云，还老是怨恨社会把自己遗忘了。在边缘处呼喊，在高寒处焦虑，总是落不到点子上。我尤其看重那些在险恶环境摸打滚爬中培养出来的品质，任何不经残酷现实磨砺而生出来的所谓高调的言说，都是值得怀疑的！

钱理群当年呐喊出“青年人就应该浪漫、狂妄、想入非非”的时候，会场一片掌声，有不少人叫好。如果老钱现在还这样喊，我更多是沉默了。有一点我十分想探究，作为老钱弟子的孔庆东应该是最早终结老钱的人，信不

信，请读下面孔先生《老钱的灯》中的文字：

老钱在世上混了五十个年头了，还没有混到一块法定的私人居住空间。可他还是一天到晚弥勒佛似的教导我们如何做学问。我有时便不免暗发一点鲁智深式的腹诽：今日也要做学问，明日也要做学问，冷了弟兄们的心。

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钱先生有孔先生这样的弟子，也是一种因果。我猜测，孔先生大约是从钱理群先生虚妄的精英主义里看到了某种过时的堂·吉诃德精神吧？于是，孔先生自然会从高蹈的天空降落在世俗的地上，选择了“生活的智慧”。但是，至少表面上他还坚持高举某种招牌，真是精明到家了。孔先生就从“老钱”那里继承了一样东西，就是一种抽象的激情和抽空了自我反思的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

## 四

钱理群的知识结构比较简单，尤其缺乏哲学和宗教素养。

1939年，只有19岁的王元化写了一篇惊世的文章《鲁迅与尼采》。这篇文章显示了青年王元化的哲学功底，思辨的高度在那时是少有的。他是个在旋转的坐标里静思的人，对美学、佛学、史学有独到的理解。他给我的印象是主张综合研究法的，从不孤立地看待问题。他讲鲁迅确实很投入，几乎是拜倒在鲁迅脚下，不过一个人能从鲁迅那里得到那么多东西，也实在太难得了。钱先生和反抗的东西之间，构成了一种紧张和对峙关系，由于缺乏新的精神资源，暂时不会从本质上走出鲁迅的影响。

如果没有信仰，任何的道义指向和价值判断都成了无的之矢。剩下来的，只有人的无名冲动、焦虑不安和无穷无尽的背叛。正像在卡夫卡的小说中一样，人被置于辽阔无边的荒诞之中，生活在没有来由的折磨之中。钱先生根本就是个信仰的虚无主义者和思想的怀疑主义者。他的文学才华不足以帮助自己完成心灵的皈依问题，人们更无法从他身上找到出路。我觉得钱先生再